



①

王洪鈞「書生辦報：張季鸞的風範」插圖

①名報人張季鸞遺照。（楚崧秋教授提供）

②作者（前立者）與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師生合影。



②

書生辦報

(本文插圖刊第42頁)

張季鸞的風範

●王洪鈞(中國文化大學教授兼新聞傳播學院院長)

凝結民心激勵士氣

世界上最偉大的教育力量，不是學校，亦不是一本教科書，而是一種足以師法的風範。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孔子是世所公認的大教育家；他的一言一行皆能表現一種風範；因此，顏淵才讚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這就是說，孔子對他學生的影響，無時不在，無地不在。試問，身沐其中，能不變化氣質者幾稀！

今日是個大教育的時代。無時不在，無地不在的教育力量，已為大眾傳播所取代。尤以報紙，既然具有告知、解釋及忠告的功能，可稱集「友直、友諒、友多聞」三益友之大成。身為報人，一筆在握，其對世道、國運及人心之影響，實無法衡量。

祇是現代報紙，淪為政治工具者，固不必言；在西方國家，受自由理念之影響，亦已經高度商業化。每日出版之報紙，一如商品，唯讀者之

喜愛是求。報業經營者醉心利潤及企業形象，遠超過其對社會應盡之責任與影響。以美國而言，欲求如十九世紀偉大報人如格里雷(Horace Greeley)者，已不復見。所謂報人風範亦難得提起。反倒是電視主播、專欄作家，竟取代偉大之編輯人，成為媒體英雄，為大眾所歌頌。

現代報業，兩個階段

我國現代報業，早期固受西方教士及外商之影響，但自一八七〇年代，國人辦報初露曙光；至一八九〇年代，更見耀眼之光芒，無論為士人辦報或革命報紙，皆志在開啓民智，喚起民衆，結束滿清之專制統治，實施民主憲政，俾將四千年之古國，改造為一個現代化之國家。因此，中國現代報業自誕生之際，便與國運及國家發展結為一體。十九世紀轉頁前後，許多報紙受政治壓迫或經濟壓力，倒閉或遭封閉，報人繫獄者纍纍。但開國報人對國事之憂患意識及文化使命感，已蔚為一代中國報人之風範，影響於國家社會者，世所罕見。中華民國建國近八十年迄今，前一階段，歷經袁世凱稱帝、軍閥割據、北伐統一、

抗日戰爭及中共倡亂，可稱國無寧日，民不聊生。中國報業，大體而言尚能承替前一代報人之遺風，以國脈民命是爭。尤以抗戰期間，除申報、新聞報等純商業報紙，托庇外人保護，續留淪陷區外，舉國民心之凝結、士氣之激勵，集億萬人心如一心，全靠政論報紙及黨營報紙之鼓吹，使輿論力量得以發揚。前者，以張季鸞主持筆政之大公報足為典範。後者，則以中國國民黨建立之黨報體系及其他新聞傳播機構代表。

關係國運，制式經營

先總統蔣公對此一階段報業與國運之關聯及新聞記者之社會角色，曾有極深入之評價。有謂：「新聞記者應為國家意志所由表現之喉舌，亦即為社會民衆賴以啓迪之導師。我國五十年來國民革命之事業，其由萌芽而發展而成熟，皆與新聞界有極深之關係。其消長進退之機，亦視新聞界之認識與努力以為斷……今當全國努力抗戰之時，我新聞界為國奮鬥責任之重大，實不亞於前線衝鋒陷陣之戰士。如何宣揚國策，統一國論，提振人心，一致邁進，而完成三民主義

國家之建設，實唯新聞界之積極奮起是賴。」（蔣中正「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對中央政校新聞班畢業生訓詞」）中共政權崛起，政府播遷來台後四十年，應屬後一階段。此一階段，中華民國必須生存壯大於若干基本上難以調和之形勢中。國家一方面仍在戰時，必須實行戒嚴法令，另一方面卻要厲行民主憲政，維護新聞自由。一方面政府既以光復大陸為國策，期能擊敗中共之和平統戰，自需要全民意志集中，團結和諧；另一方面，潮流所趨，仍須以建立民主開放的社會為號召，承認多元價值觀念，尊重個人權利。一方面，國家需要勤儉建國，養成節約風氣，另一方面，政府則力倡自由經濟，鼓勵消費力，提高國民物質生活水準。在上述一連串不調和的政治指標下，報業祇有在一種制式化的經營下自求多福。長期的報禁保障了少數既得利益的報業經營者；威權政治亦萎縮了報業的正常功能。報紙既已鑄型，報人更無風範可言。

報禁解除，自救呼聲

及報禁解除，經營權利開放，言論自由放寬；雖然報紙之頁數、內容均見豐厚，新增報紙與資金雄厚的商業及官方報團則互相陷於苦戰，使報業市場出現了一片紊亂。供求機能全失，以聳動內容及優惠條件「強銷」作風極為普遍。公衆對報紙開始產生了厭食症。據調查顯示，社會在報禁開放前對報紙滿意的程度尚能維持百分之七十二點六，報禁開放後，已降為百分之五十一點一，百分之八十一點四的受訪者主張對報業「托辣斯」有所限制，百分之八十二點五的受訪者強

調社會責任重於新聞自由。尤以若干具有高度專業觀念的新報相繼夭折，更顯示報業發展之重重危機。因此，報業自救呼聲此起彼落。咸認為倘任憑商業主義及無節制的新聞自由誘引報業，自構成國家重要體系的地位，向外游離，倘使今日報業背棄中國傳統報業的憂患意識及文化之使命感，流為庸俗的新聞販賣業，不獨將造成中國報業之悲劇，且終不免殘化報業對國家和社會的輿論功能。

如何使今日報業重振開國前後報紙創機造勢之磅礴氣概，導引國家社會渡過黎明前的黑暗時期，似唯有自先進報人中尋求其風範，以供師法。開國報人，有筆如槍，義無反顧，鼓動風潮，遞嬗政體之時代背景雖已不存，其為民前鋒覺醒天下的悲憤情懷，仍是為今日仁人志士之榜樣。置身此際，念及報業地位之衰微，輿論功能之不彰，國事混沌，人心惴惴；其能樹立卓然獨立之中國報人風範，足使現代新聞記者心嚮往之者，唯有榆林張季鸞先生。因為自民國十五年到民國三十年，由張季鸞先生主持言論及新聞之大公報，於民國達成統一，國民產生共識，以迄全民抵抗侵略，提升國家地位方面充份發揚了輿論報國的中國報業傳統！

學識淵博志行高潔

張季鸞先生，名織章，陝西榆林人，生於一八八六年（一說為一八八八年），自幼失怙恃；因在鄉讀書，文才優異，一九〇四年，保送三原宏道學堂；翌年，以陝西考選留日學生獲取，一

九〇九年東渡日本；在日期間，開始參與雜誌出版工作，為獻身新聞事業之嚆矢。

武昌起義後，季鸞先生返國，參加其鄉賢于右任先生創辦之革命報紙「民立報」工作，鼓吹革命思想；民國二年到北京，任北京「民立報」總編輯。因憤慨袁世凱派人刺殺宋教仁，曾直言譴責，一度被捕繫獄。

兩度繫獄，文人論政

稍後，季鸞先生返上海，加入「大共和日報」；民國七年，在上海創辦「民信日報」。袁世凱死後，季鸞先生再去北京，接辦「中華新報」。民國八年，北京警察廳以新聞界登載中日大借款密約，封閉八家報館，「中華日報」即為其一；季鸞先生亦因此再度繫獄。

出獄後，季鸞先生復返上海，主持「中華新報」；民國十三年，失業返北京；民國十五年，與吳鼎昌、胡政之接辦英欽之於一九〇二年在天津創辦之「大公報」。

自民國十五年至民國三十年期間，大公報之筆政及新聞方針，皆由季鸞先生主持，乃使「大公報」在國家深陷內憂外患最艱危之階段，成為全民輿論之象徵，更獲國際之重視。民國卅年，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頒贈「大公報」榮譽獎章。戰時，中國新聞學會及重慶各報聯合委員會於民國三十年五月十五日在重慶舉行盛大慶祝會；季鸞先生當日撰論強調中國報人之精神，並指出「大公報」按商業方法而經營，仍保持文人論政之傳統。季鸞先生於民國三十年歿於重慶。綜觀其獻身報業三十年，以半生的報人生涯，嘔心瀝血，

灌注於「大公報」，終使「大公報」在「不黨」、「不賣」、「不私」、「不言」四志勵勵下，成爲中國書生辦報之典範，對國家和人民作了最大的貢獻。因此，季鸞先生逝世後，哀榮極盛。蔣中正委員長唁電中以深厚的情誼寫出：「執手猶溫，遽聞逝世」，並以「一代宗師」題輓致悼。國府褒揚令中，更稱：「張織章學識淵通，志行高潔，從事新聞事業歷三十年，以南董之直筆，作社會之導師。」布衣而爲天下師，庶幾爲季鸞先生所創立之中國報人風範。

道德文章典型足式

季鸞先生，一文弱讀書人，爲什麼能以如椽大筆的力量擔負起百年僅見文人論政、書生報國的使命？如前所述，我國現代報紙之經營方法雖來自西方及東瀛日本，辦報之理念，亦自西方新聞學術爲其圭臬，但敢自稱爲中國報人者，莫不繼承了我國先秦時代歷史家之精神，辨是非、張正氣、避邪氣，義無反顧，視死如歸。尤以季鸞先生天性仁厚，集數德於一身，更豐富了中國報人的品格才智，自成典型。

管窺所及，以爲季鸞先生的言行文具有下列風範，可稱集合了中國的史家、士人及革命志士的明澈、灑脫、超然、從容的特色，且不強調其文筆的剛柔互濟，出乎至誠，見於文章。

關懷天下·國士自許

一、關懷天下：新聞記者原應目光四射，關懷天下，季鸞先生獨富有中國讀書人對天下蒼生所負的使命感，而期藉言論有所獻替。

季鸞先生所撰「中國新聞學會宣言」中，便流露了許多與天下共憂樂的情懷。其如：「同仁今日集會陪都，緬懷共和締造之艱難，體念國難犧牲之壯烈，承近代言論先輩之遺志，而自省其對歷史人羣所應負之重責，誠以爲少數報人，其雙肩擔負，乃有無窮之重。」（見民國五十一年九月一日出版「中華民國新聞年鑑」）

季鸞先生恆以國士自許，認爲救國濟世，人人有責，固不待於軍人政客。譬如民國十五年，季鸞先生等接辦「大公報」之初，便自矢「再爲鉛刀之試，期挽狂瀾之倒」，「依時立言，勉效清議」。所以大公報之言論及新聞處理，無不以放眼天下之目光，突顯國家之地位。民國廿五年四月一日，「大公報」同時刊出津滬版之際，季鸞先生曾撰論稱：「將不斷記載當前之危機，喚起全國之奮發。至於我國立國精神，原爲人類平等，故世界禍福，皆所關心。」

民國廿七年六月，季鸞先生著文探討新聞記者從事報導工作之基本態度，曾說：「報人採訪新聞，撰述紀事，要採純客觀態度，公正無私，有謂：『自根本上講，報人職責在謀人類共同福利，不正常的自利其國家民族，也是罪惡。』」民國卅年五月十五日爲「大公報」接受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獎章之社論中特別強調：「中國思想是世界一家，我們愛中國，也愛世界。」

天下一家·世界趨勢

季鸞先生所提倡的中國報人之世界觀或天下觀，研究其思想者，尙少提及。其實這種目光祇有在中國政治文化中培養，西方國家之人文地理

環境恐難孕育出這樣的觀念。

原因何在？誠如季鸞先生所說我國古代的政治與文化，向以天下爲一家。禮運大同篇所揭示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的福利社會遠景，正因爲在孔子思想中鄙視霸業，獨重仁道。孔子說過「蠻夷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蠻夷，則蠻夷之」，足證中國儒家不以人爲的國界爲國際，卻以人性的國界爲國際。因此，中國的讀書人便秉承這種「樂以天下，愛以天下」的胸懷，關心人類之安危。其如宋儒范仲淹則更進一步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爲志。季鸞先生主張「報人職責在謀人類共同福利」淵源在此。

或以爲今之國際社會，爾虞我詐，各爲己謀，果中國報人志在天下，豈不流於迂腐？孰不知中國文化之優良既在於成熟。我以天下爲一家，事實上，正是今日人類社會唯一生存的希望。季鸞先生有謂：「國際友誼靠報人維持，世界文化靠報人流通。」證諸今日世界資訊流通之「全球化」(Globalization)，正是如此。因爲現代傳播科技早已打破國界，無微不在，無遠弗屆。未來傳播發展，報人倘無健全之世界觀或稱天下觀，影響所及，豈是人類之福。我國傳播事業在硬體上或不及西方，但傳播之哲學，應對西方有所補益。則季鸞先生關懷天下眼光，自可成爲中國報人應具之風範。

愛國救國·憂傷感情

其二、熱愛國家：季鸞先生自幼年便過著艱辛的日子；及負笈日本，從黨人及志士遊，更深

感國亡無日之危機。回國之後，季鸞先生目睹國難日深而民心麻痺，不禁悲憤填膺，日夕呼號者，惟愛國與救國！

季鸞先生所撰文字中，經常流露出內心對國家之焦慮，甚至自恨自責，未能一盡報人之天職！

季鸞先生於接辦大公報之初，固已揭櫫「言論報國」之理想，但由於自民初迄抗戰，國事凋瘵，輿論不張，季鸞先生乃將滿腔悲憤，化為錦繡文章。民國廿年，大公報發行一萬號，季鸞先生在紀念詞中痛貶清帝「僞立憲」，北洋「僞共和」兩個時期一個問題之不能解決，進而指出：「三十年來，本社前後同仁之痛苦煩悶，今猶有待於掙扎奮鬥者也。近代國家報紙負重變使命，而在改革過渡時代之國家為尤重。……故（同人等）於十五年天津反動政治最高潮之時，更毅然接辦本報，更為鉛刀之試，期挽狂瀾之倒。歲月忽忽，又數年矣，而所謂言論報國者如何？茲際紀念，悲愧交併矣！」

民國廿五年，是中日戰爭爆發前一年，時局緊張，國難殷重，人心憂惶，季鸞先生於是年四月一日撰「今後之大公報」社論，開頭就說：「本報同人認識祖國目前危機異常重大，憂傷在抱，刻不容紓。」復稱：「本報同人自漸瀕臨，徒切悲悚，惟於榮心焦慮之餘，以為挽回危局之道，仍在吾全國各界之智慧與決心。」同年九月一日，季鸞先生在「本報復刊十年紀念之辭」中復稱：「十年來徒隨時勢而悲喜，常顛倒與奮希望與失望，自愁與自解，或憂傷感憤焦急企盼之各

種情緒間。」

惟其以孤臣孽子之心，獻身國是，季鸞先生在當時每一執管，憂傷悲憤之情，便自然流露。其間最使人感到惘然者，咸稱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蔣委員長西安蒙難之際，季鸞先生所寫「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社論。季鸞先生在那篇社論中以一字一淚的筆調，勸告張學良、楊虎城說：「你們快快把蔣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場！這一哭，是中國民族的辛酸淚，是哭祖國的積弱，哭東北、哭冀東、哭綏遠，哭多少年來在內憂外患中犧牲生命的同胞！」讀文至此，相信愛國之士，必亦同聲一哭！

民國廿七年，抗戰軍興，全國人心振奮，季鸞先生愛國熱情洋溢，恨不能挽袂而起，投筆從戎。在是年十月十七日所撰「本報移渝出版」社論中曾寫下了極具感性的文字，略稱：「我們這一年多，實在無成績，但自誓絕對效忠國家，以文字並以其生命獻諸國家……假若國家需要我們上戰場，依法徵召，我們便擲筆應徵。」由此可見季鸞先生的愛國救國熱忱，完全出之一片摯誠。

最後叮嚀·悲憫感激

季鸞先生民國三十年九月六日逝世，半年之前，亦就是三月十六日，他寫下一篇膾炙人口的「中國新聞學會宣言」。這一篇文字固然表達了全體中國報人的心聲，其中於中國報人對國家之責任，更是說得透澈，充份顯示季鸞先生個人的國家觀念。文稱：「我國報人與國家民族命運，具有最密切之關係」；復謂：「吾儕報人對抗（

戰）建（國）實負有重責，夙夜自勉，不敢懈怠，有利國家萬死不辭……當茲興亡成敗之交，惟有至誠至勇，盡忠報國，使中國得其自由平等，萬民享其樂利。」更稱：「吾儕報人，以社會之木鐸，任民衆之先鋒，更應絕對以國家之利益為利益，生命且不應自顧，何況其他？」

季鸞先生去世，未寫遺囑。這篇文字實可視為他對中國報人同儕的最後叮嚀。悲乎國士之歿！

其三、悲憫感激：一般人多強調季鸞先生的「報恩主義」，那是因為他在「歸鄉記」中，以「報恩主義」說明他的人生觀。其實，季鸞先生關懷天下，熱愛國家，固出自對人類蒼生一片悲憫之心，有了這片悲憫之心，才能化為感激，化為報恩。

呂坤「呻吟語」中有謂：「聖人悲時憫俗，賢人痛時疾俗，衆人混時逐俗，小人傷時敗俗。」雖說祇有聖人，才有悲憫心情；報人並非聖人，甚至談不上賢人，需悲憫之心為何；其實，報人亦好，其他種類的新聞記者亦好，無論是客觀報導新聞，公正表示意見，但懷抱悲憫之心者，常可使大衆化仇恨為友誼，化誤解為諒解；化妒忌為同情，化悲觀為樂觀。

軫念民生·報恩主義

季鸞先生的悲憫懷抱，祇看他時時想到民生之痛苦無依，而勇為其喉舌，便可想知。接辦大公報未久，季鸞先生在各地派出旅行通信員，調查民生狀況。當調查河北各縣情況發表後，季鸞先生於民國十九年十一月二日撰論稱：「願問全

國讀者諸君，對於此荒蕪頹廢的祖國河山，窮苦蒙昧的同胞大眾，是否動悲憫，感恥辱，生責任之心，發救濟之願？」足證季鸞先生的思想邏輯，必是先動悲憫，而知羞恥，而生責任心，而發救濟願。簡言之，感激來自悲憫。

季鸞先生的悲憫心情，是內蘊的，但遇外在刺激，必有所觸發。譬如他在「歸鄉記」中提到遊領北臺時，看到「成列的烽墩，向東西兩方，無限展開；向西一直通寧夏，向東到黃河，看這四百年前軍事上的偉大設備，令人想見祖先們保邊衛國的辛苦。再往上想，從周秦以來，吾族祖先們在這萬里邊塞之間，不知流了多少頭血，受了多少艱苦！一代又一代地這樣防禦着，奮鬥着，榮枯盛衰之間，不知犧牲了多少仁人志士。我在領北臺，對於荒沙殘照，不由得泛起種種思潮。」從室外荒沙殘照，引發榮枯盛衰的種種思潮，寧非聖人的悲憫！哲人之悽愴！

因此，他在「歸鄉記」中乃道：「我的人生觀，很迂淺的，簡言之，可稱報恩主義。就是報親恩，報國恩，報一切恩！我以為如此立志，一切祇有責任問題，無權利問題，心安理得，省多少煩惱。」他又說：「本來報恩之道，人各有其宜，不必一律，我祇希望大家都親親而仁民，推廣骨血的至情，涵養愛人愛國的摯感。」

仁的精神·敢言善言

從悲憫，而感激，而報恩，這正是儒家「仁」的精神。正因為有此懷抱，季鸞先生乃對世事關注，對國家熱愛，對社會同情，對人人皆存忠厚，世稱：「志士仁人」，大抵如此！

季鸞先生歿後，其好友胡政之說：「季鸞為人，外和易而內剛正，與人交輒出肺腑相示，新知舊好，對之皆能言之不盡。而其與人亦能處處為人打算，所以很能得人信賴。」這段話雖然平實，亦足代表一種風範。

其四、敢言善言：我國自先秦始，史家的精神便是直言和敢言。固無論「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亦無論太史公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即是歷代士人、言者，無不秉承這種精神，發揮春秋之大義；不受威脅，不為利誘。開國報人率皆繼承我國這種史家精神，踵事增華，而成為中國報人獨具之風格。

季鸞先生在所撰「中國新聞學會」宣言中曾謂：「清末咸同以來，滿政窳敗，外患侵陵，瓦解之勢已成，亡國之禍無日；當是時也，海內外之志士仁人，遠承數千年歷史文化之精神，近受明末諸大儒革命思想之陶冶，據復活之國魂，為革命而奮起，其武器無他，報紙言論是也。」季鸞先生深受史家精神之薰陶，對開國報人多所感念，復對「中國自古清議在於民間，故處士譏議為一切政治運動之母」，念茲在茲，乃視此精神為中國讀書人言論報國之圭臬。

議政勇敢·文如其人

尤其民國十五年至民國卅年，內憂外患，國勢岌岌，季鸞先生雖為人敦厚，惟議政勇敢，且時時以獨立之言論自惕。季鸞先生嘗謂：「但本良知發言，不計利害毀譽」，「對政治貴敢言」，「不畏強權」，「不媚時尚」。因此，讀季鸞先生之文章，無不感正氣淋漓。

然而，季鸞先生的文體，卻是將百駟鋼化為繞指柔，自然灑脫，正如其人。無論世界局勢，國家政事，皆能娓娓道來，如鼓家常；義理嚴密而情辭懇摯，沁人肺腑。古稱言難。進言者必以「情欲信，辭欲巧」為尚。梁啟超固然自詡「筆端常帶感情」，猶難免粗獷有偏。季鸞先生之文，就議論而言，可稱爐火純青！

盛景難再永懷風範

季鸞先生逝世，瞬間已近半個世紀。其畢生言論報國，勞瘁以歿，未能目見抗日戰爭之勝利，國家之儕身四強，誠足為憾。但最可憾者，仍為季鸞先生關懷天下，熱愛國家，悲憫感激及敢言善言之中國報人風範，竟未能久傳，更遑言發揚光大。即是今日集報學界諸君子於一堂，對季鸞先生之志事風範，以感激崇拜的心情，援引闡釋，亦非基於思古之幽情，毋寧是藉先賢之遺風，樹為這一代報人之典型，以療今日報業之病疾。

如前所述，我國開國報人，無論為士人辦報或革命報紙皆有其創造時勢領導輿論之目光與志氣。王韜、容閔固是我國報業先賢，梁啟超以「救國為己任，言論覺天下」更奠定了士人辦報的範型。國父孫中山勉革命報人以先知先覺自任，尤其創造了中國報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風範。

波瀾壯闊之開國盛景，不能重現；但自張季鸞先生對書生論政之謳歌，及對國父孫中山作為「中國最偉大之筆」的推崇，吾人初可認定季

鸞先生確以融會我國現代報業諸先賢之遺風，豐富了中國報業的傳統。此所以季鸞先生一再陳述中國報業之特色，不在於一種「大的實業經營」，而是「文人論政」。

就今日時代潮流及國家發展之趨勢，報紙之實業經營殆屬必然。但文人論政的精神，包括本文前所指出關懷天下、熱愛國家、悲憫感激以及敢言善言等，由季鸞先生所塑造的中國報人風範

，卻不應被庸俗的商業主義所取代，乃至殘化了輿論作用，紊亂了文化價值觀。

民國七十六年三月廿日，為季鸞先生百年誕辰，筆者曾撰「布衣而為天下師」一文紀念之。文末有謂：「國家今日，否極泰來，形勢見好，獨人民心理分歧，國家意志渙散，似非與國之兆。緬懷先賢，放眼未來，相信國家亟切需要再有一個『大公報』，為國家之精神干城，為輿論之

象徵；需要再有一位張季鸞，以國士無雙之精神，以『南董之直筆，作社會之導師』。尤以報業『三限』解除之後，季鸞先生憂世愛國、悲憫感恩之精神，更應懸為一代新聞記者之座右銘。」

謹以虔誠的心情，將這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束！（民國七十九年九月十六日脫稿於文化大學）

本文註釋因篇幅關係從略，敬請讀者鑒諒。

故國河山長聯佳句（卅）

章喜元輯

西湖花神月老祠

廿四節風吹紅萼，悟蜂媒蝶使，總是姻緣，香國無邊花有主；
一百年繫定赤繩，願纓李夭桃，都成眷屬，情天不老月長圓。

西湖宋莊

山外斜陽湖外雪；
窗前流水枕前書。

西湖聖因寺

山外皆山，巒岫繞成清淨界；
畫中有畫，笙歌譜就太平圖。

西湖葛林禪院

月似丹光出高嶺；
鶴因梅樹住前山。

杭州靈隱寺

龍澗風回，萬壑松濤連海氣；

驚峯雲歛，千年桂月印湖光。

靈隱寺天王殿

立定脚跟，背後山頭飛不去；
執持手印，眼前佛面即如來。

淨慈寺

雲間樹色千花滿；
竹里泉聲百道飛。

杭州雲棲寺

身比閑雲，月影溪光堪證性；
心同流水，松聲竹色共忘機。

岳王廟

青山綠水拱重檐，西湖名勝，有忠殿迤立；
碧血丹心保疆域，正氣碩節，留后人仰瞻。

岳飛墓

青山有幸埋忠骨；
白鐵無辜鑄佞臣。

秋瑾祠

巾幗拜英雄，求仁得仁又何怨；
亭台悲風雨，雖死不死終自由。

蘇小小墓

桃花流水杳然去；
油壁香車不再逢。

杭州葛嶺

明月倒涵漁港棹；
晚霜背聽風林鐘。

杭州玉皇山

一路竹聲，時疑雨至；
半空嵐氣，忽然雲飛。

杭州吳山

八百里湖山，知是何年圍畫；
十萬家燈火，盡收此處樓台。